

論文編號：41082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2022/23 年度「專題研究」論文

身份探索——論潘國靈《總有些時 光在路上》的旅行書寫

導師：何杏楓教授
學生：羅 彥
學號：1155126022

提要

潘國靈，作家與文化研究者，自九十年代中至今發表超過二十部著作，作品類型包括小說、散文、詩、文化評論等，皆表現出他對城市敏銳的觀察。潘國靈對城市及香港的關懷備受學界關注，現存論述主要圍繞其小說展開，其旅行經歷及書寫則多用作旁證。2022年，潘國靈首度出版以「旅行」為主題的散文集《總有些時光在路上》，結集他2003年至2021年寫作的旅行散文。全書除記錄潘國靈於各城的見聞，亦交織了他對各地文化藝術的想像以及對自身的省思。潘國靈以「都市浪遊」的游離狀態貫穿多個旅程，交疊其作者、旅人、文化人等多重身份，並在旅途中不斷反思本土與世界的連結，借他者探索自我。

本文著眼潘國靈的旅行書寫，分析《總有些時光在路上》各篇呈現出之身份探索。全文將先整理香港旅行書寫之研究概況及潘國靈的旅行特點，然後從三方面切入潘國靈在旅行中的觀察，包括潘國靈對香港身份內涵的尋索、對香港身份建構之反思，以及城市創傷後對香港身份之重塑，分析潘國靈透過「他者」觀照自身的視野與所獲。

關鍵詞：潘國靈；旅行書寫；香港身份

目次

第一節 引言	1
第二節 旅行書寫與潘國靈之行旅	2
(一) 旅行書寫	2
(二) 游離、遊牧、浪遊：潘國靈的旅行書寫	4
第三節 保存與重建——香港形象之內涵	7
(一) 後工業形象之建構	8
(二) 自我之失落	9
(三) 小結	13
第四節 接受與表述——香港身份之建構	13
(一) 文化符號粗俗化	13
(二) 書寫之可能	16
第五節 流放與療癒——香港認同之重塑	19
(一) 情感流放	19
(二) 身份沉思	20
第六節 結語	22
參考書目	24
附錄一：《總有些時光在路上》各篇寫作日期	27
附錄二：潘國靈著作與《總有些時光在路上》各篇創作時間對照	29

第一節 引言

潘國靈，作家與文化研究者，1998 年發表首部小說《傷城記》，其後所發表的文類延伸至散文、詩、文化評論等，至今著作超過二十部。潘國靈的作品頗為關注香港處境，¹ 李歐梵評價潘國靈是「『浮城』的傳人」，指他「在不停地為「我城」效力——扶著它，頂著它，使它不至於下沉」。² 學界亦關注潘國靈對城市及香港的書寫，然而現存論述主要聚焦於其小說創作，其旅行經歷及書寫則多用作旁證。³

2022 年，潘國靈發表首本旅行散文集《總有些時光在路上》⁴，記錄他在各城的見聞，同時交織了他對各地文化藝術的想像以及對自身的省思。全書收錄之散文的寫作時間由 2003 年至 2021 年，橫跨潘國靈大部分寫作生涯，當中的省思同樣貫穿他多年的寫作命題——香港。王家琪指出，旅行文本是觀察香港身份認同的有利視角，能夠把本土問題意識化。⁵ 李歐梵言「潘國靈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所以無論在世界任何地方，處處也時時不忘香港。」⁶ 潘國靈自身亦有意識地透過旅行中探索香港，言「要出一出去，才能更加明白自己的城市。常常在自己的城市，會有一種局限」。⁷ 可見，潘國靈的旅行書寫帶有自我身份探索的特質。

¹ 如有短篇小說集《傷城記》（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 年）、《離》（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長篇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城市論集《城市學：香港文化筆記》（香港：Tomart Limited，2005 年）、《城市學 2：香港文化研究》（香港：Kubrick，2007 年）、《事到如今——從千禧年到反送中》（香港：Kubrick，2021 年）等。潘國靈的著作年表，見本文附錄一。

² 李歐梵：〈遊牧精神〉，載潘國靈：《城市學 2：香港文化研究》（香港：Kubrick，2007 年），頁 6。

³ 專論潘國靈小說的文章包括有王展煒：〈解構潘國靈小說：作者與文本的互涉關係〉，《百家文學雜誌》第 20 期（2012 年 6 月），頁 20-25；凌逾：〈開闢新時代符號創意：潘國靈小說論〉，《香港作家》2015 年 7 月號（2015 年 7 月），頁 14-17；凌逾：〈創世紀的寫托邦與消失美學——論潘國靈首部長篇《寫托邦與消失咒》〉，《文學評論》第 46 期（2016 年 10 月 15 日），頁 39-48；張清秀：〈那些年、那些事——潘國靈筆下的都市記憶〉，《文學評論》第十九期（2012 年 4 月 15 日），頁 117-118 等，茲不贅述。

⁴ 下稱《總》。

⁵ 王家琪：〈從八十年代初香港作家的中國遊記論本土的身份認同——以《素葉文學》為例〉，《臺大中文學報》第 50 期（2015 年 10 月），頁 84。

⁶ 李歐梵：〈序〉，潘國靈：《第三個紐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8。潘國靈在 2009 年透過香港天窗出版社首次發表《第三次紐約》，在修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版本時，潘國靈把〈第三個紐約〉放在全書首篇以提綱挈領，又增補了許多篇章，認為「簡體版比原來的繁體版更勝一籌」。故此，本文選擇《第三個紐約》2011 年於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之版本，不取 2009 年之香港版。參見潘國靈：〈自序〉，《第三個紐約》，頁 10。

⁷ 楊喜盈：〈潘國靈：總有些時光在路上，旅行見證下的生命軌迹〉，《明報·星期日文學》（2022 年 3 月 6 日），<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20306/1646504061937>（2023 年 3 月 25 日瀏覽）。

本文關注潘國靈旅行書寫中對香港身份的反思。潘國靈言：「長期呆在一個地方，習慣了一種步伐，有時就想藉著空間的轉移。尋找陌生化的感覺。」⁸ 潘國靈以「都市浪遊」的游離狀態貫穿多個旅程，不依循既定的規範或秩序遊覽城市，從中探索城中的空間與身份，並在陌生激盪出對本土與世界的反思，借「他者」探索自我。潘國靈言：「旅居者複疊著學生、文化交流者、駐校作家、普通旅客等不同身份。」⁹「他者」除了指出潘國靈帶著對本土（香港）的記憶書寫異地外，同時蘊涵他自身觀察眼光的複雜性，當中呈現出他對香港身份豐富的思考。

本文將先概述香港旅行書寫及潘國靈的旅行情狀，然後從三個層面切入，分析他如何透過旅行思考香港身份，同時關注其自身不同角色如何影響他探索的目光：第三節探討潘國靈在書寫異地形象時對香港的文化身份的反思；第四節闡述潘國靈對城市身份建構的省思，以及在外地敘述香港故事的困難與優勢；第五節細讀旅行如何助潘國靈處理對本土的複雜情感，以及在關懷外地的歷史文化途中尋得重塑自我的養分。綜合上述三個層次，期望能夠總結出潘國靈觀察及反思自我的方式，以及他所探索出的香港身份。

第二節 旅行書寫與潘國靈之行旅

（一）旅行書寫

旅行文學在西方的淵源甚早，¹⁰ 華文世界的「旅行文學」則在二十世紀末才開始獲得重視。¹¹ 當時，許多學者質疑「旅行」成為一種「文學」類型。¹² 例如鍾怡雯認為「旅行文學」的含義尚需更多專業旅者之深度論述，故以「書寫」代替「文學」，以表達兩者之間的過渡，發展出「旅行書寫」的用語。¹³ 目前華文地區對

⁸ 凌逾：〈與潘國靈對談錄（下）——關於跨界、消失與詩性（訪談）〉，《城市文藝》總第八十八期（2017年4月20日），頁67。

⁹ 潘國靈：〈旅人，不止一個〉，《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香港：明窗出版社，2022年），頁11。

¹⁰ 現代旅行文學於十九世紀的歐洲開始興起。由於當時社會財富增加、現代交通工具出現，許多中產階層開始能夠輕易前往世界各地旅行，產生許多與旅行經歷相關的書寫。初期的主要書寫者乃殖民者或白人作家，表現出殖民帝國對殖民地的凝視。二十世紀，許多殖民地開始脫離殖民統治，逐漸出現「反旅遊文學」。曾經歷過殖民統治的作家透過書寫自己的旅行經歷，反抗由白人主導的旅遊文學。第二次大戰後，交通發展大幅改善，飛機及汽車的普及促進了大眾化的旅行活動，全球旅遊業在二十世紀末獲得空前發展，現代華文旅遊文學也在這段時期產生。參見王恩涌等編著：《人文地理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245；張淑英：〈旅行：世界在我心中〉，載世界文學編委會編：《旅行文學》（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頁3。

¹¹ 中國古代文學中一向有「遊記文學」的題材，並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的《詩經》，發展至西漢《史記》、南北朝開始發展之「山水」、「田園」詩等，皆是中國傳統旅遊文學的重要文本。由於上述作品的描述對象主要是國內景色，並非現代旅遊文學所指的到訪異域，故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內。參見王恩涌等編著：《人文地理學》，頁244。

¹² 鍾怡雯：〈旅行中的書寫：一個次文類的成立〉，《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4期（2008年3月），頁35-37。

¹³ 同上注。

「旅行書寫」的研究，以對台灣的論述較為全面。¹⁴ 香港文壇遊記作品在七十年代末開始廣泛產生，¹⁵ 目前已有部分具代表性的論文，當中以對也斯的旅行書寫的論述最為豐富。¹⁶ 然而，香港作家旅行書寫的論述始終散見於不同論者，尚未建立起清晰的脈絡。此外，相關論述的研究對象較集中於千禧之前，對近二十年的旅行書寫則鮮有關注。¹⁷ 由於香港之旅行「文學」的論述尚不充足，本文將採鍾怡雯之觀點，以「旅行書寫」指稱潘國靈的旅行散文。此外，「書寫」字眼能夠聚焦於作者在異地觀察、書寫的行動及過程，而「文學」較側重於則在於書寫後的作品本身，本文取「書寫」而不用「文學」，能有助闡述潘國靈旅行途中的觀察視野。

18

旅行文學的研究常使用「我和我自己的感覺」和「他者之眼」兩個角度，論者著重描述出作家在看與被看、來去之間的思想、行為的差別與變化。¹⁹ 也斯指出文化身份的追尋往往可以透過描繪「他者」開始，包括其他時空、離開土地後所遇到種種不同的人等。²⁰ 潘國靈的旅行書寫同樣包含了對自我的感受以及以「他者之眼」對外地的觀看與描繪，表現出對香港身份的思考，而其反思的方式，大致可

¹⁴ 目前已有台灣現代旅行書寫的專書，例如陳室如：《相遇與對話：台灣現代旅行文學》（台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年）、胡錦媛：《臺灣當代旅行文選(增訂版)》（台北：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年）等。

¹⁵ 也斯：〈旅程與文學〉，《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香港：青文書屋，1996年），頁128。

¹⁶ 例如有陳建忠之〈在浪遊中回歸：論也斯環台遊記《新果自然來》與一九七〇年代台港文藝思潮的對話〉，連繫也斯的遊記與七十年代香港社會轉變及台港文學思潮，探討其旅行書寫與社會的關係。樊善標之〈也斯中國風景之發現—以《昆明的紅嘴鷗》遊記為中心的分析〉則集中論述也斯之旅行書寫與「中國形象」的關係。又，區仲桃之〈也斯旅遊文學的多元角度〉則論述也斯旅遊文學中的香港特性，建立多元角度之香港論述。可見，目前就也斯的旅行書寫研究，皆著重探討作家觀看世界的態度以及其書寫如何反應他的身份。見陳建忠：〈在浪遊中回歸：論也斯環台遊記《新果自然來》與一九七〇年代台港文藝思潮的對話〉，《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11卷第1期（2013年6月），頁118-137；區仲桃：〈也斯旅遊文學的多元角度〉，《中外文學》第46卷第1期（2017年），頁45-75；樊善標：〈也斯中國風景之發現—以《昆明的紅嘴鷗》遊記為中心的分析〉，《中國文學學報》2018年第9期，頁273-296。

¹⁷ 現嘗試就有限的資料整理出八十年代以降香港旅行書寫的歷史脈絡。中國改革開放後，內地多年的緊張局勢紓緩，香港、內地的往來逐漸恢復，吸引大量香港人前往中國旅遊。對於1949後在香港長大的一代人，更是他們在探親以外首次的香港體驗，故學者對此階段的旅行文學之關注多為其對中國的鄉土意識及想像，並藉此觀看香港人的香港意識。九十年代，由於回歸迫近，香港人對於自我身份的「英國性」、「中國性」、「本土性」較為疑惑，亦在旅行書寫中透露出對香港前景的反思，此階段的旅行文學研究也集中於此。至千禧年代，香港對殖民、後殖民的討論熱潮漸次減退，香港作家更加著重於香港本土的描寫，學界對旅行書寫的關注減退。參見樊善標：〈也斯中國風景之發現—以《昆明的紅嘴鷗》遊記為中心的分析〉，頁273；王家琪：〈從八十年代初香港作家的中國遊記論本土的身份認同——以《素葉文學》為例〉。

¹⁸ 根據鄭明嫻的分類，遊記主要分為景觀式及人文式遊記。景觀式指側重細緻勾勒出風土景觀，而人文式則著重作者旅行途中的人文精神活動及反思。在人文式遊記中，作者關注的不僅僅止於景觀和從人物內心出發的反思，而是對於文物、古蹟乃至旅遊景點所發生的時事，都是作者所關切的。潘國靈的旅行書寫傾向後者。參見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增訂三版）》（臺北：大安出版社印行，1988年），頁226-230。

¹⁹ 張淑英：〈旅行：世界在我心中〉，載世界文學編委會編：《旅行文學》，頁4。

²⁰ 也斯：《香港文化十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7-39。

以「游離」、「遊牧」、「浪遊」三個概念總括，三個概念的意義又相互涵蘊，表現出潘國靈獨有的旅行書寫。

（二） 游離、遊牧、浪遊：潘國靈的旅行書寫

《總》乃潘國靈首本旅行書寫之文章結集。實際上，潘國靈對旅行、觀察城市的省思貫穿於其整個寫作生涯。下文把潘國靈對自身旅行狀態的覺察整理為「游離」、「遊牧」、「浪遊」三個重心，三個重心相互纏繞，形成潘國靈旅行書寫獨有的視野。

1. 游離

《總》全書設有八章，第一章「游離省思」主要收集了潘國靈對旅行的反思，其中〈我思游離——作為生存態度、現代情狀、與價值轉向〉乃全章重心，可謂奠定了全書「旅行」的基調。潘國靈把「游離」定義為「離開依附的事物而存在」，「依附」與固定、安全、紮根等概念相互關聯，而「游離」則與流動、不穩、漂浮相關。²¹ 對於潘國靈而言，前者指作為其家園的香港，後者則指潘國靈所遊歷之處。潘國靈指出，游離者認為「恆久的據點」是束縛，相比起家園，「在路上」（*On the Road*）才是他們的皈依。²² 可見，潘國靈把自己看作為一個「游離者」，看似永遠處於流動的狀態，以在徘徊不定、不穩定當中同時獲得流動的自由，²³ 實際上此種流動的自由並非完全脫離其「依附」之物。他認為在理解事物時，從反命題（*antithesis*）切入將會有所助益，而任何形式的旅行「都有一個可回歸的家園在等著自己」²⁴。旅行帶來之漂浮不定的狀態，正是「家園」的反命題。潘國靈在遊歷各地中，縱然物理狀態是游離的，但心理狀態卻是「游而不離」——透過游離、離開執定的家園，透過異域切入思考家園。

²¹ 潘國靈：〈我思游離——作為生存態度、現代情狀、與價值轉向〉，《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47。

²² 潘國靈特意指出《總有些時光在路上》書名中的「在路上」與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同名小說《在路上》（*On The Road*）關注的命題相關。《在路上》被認為定義了二十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美國垮掉的一代。二戰後，世界正在面對多種社會、文化變革，許多國家如越南等亦持續面對戰爭的威脅。同時，美國大張旗鼓地宣揚「美國夢」，在與充滿動盪的世界局勢對照下，令這一代美國人開始質疑美國傳統的社會規範及道德價值。他們帶有反叛精神，追求和平、自由等價值，並渴求以一切刺激與探險索求自己的自由與身份認同。《在路上》描寫主角薩爾·帕拉迪斯與迪安·莫里亞蒂橫跨美國大陸的旅途，他們的旅途漫無目的，充滿放蕩不安。他們在體察各種階層的生活和縱情玩樂的過程中，檢驗所為無限自由的美國夢是否能夠實現，並尋找新的價值。潘國靈描述「在路上」才是游離者的皈依，包含了《在路上》「垮掉的一代」在漫無目的的旅途中不斷接收新的刺激，從中找到價值的意思。潘國靈自身的旅途，同樣有這一重意味。參見潘國靈：〈我思游離——作為生存態度、現代情狀、與價值轉向〉，《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49；[美]傑克·凱魯亞克著、王永年譯：《在路上》（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年），頁 III、XVIII。

²³ 潘國靈：〈我思游離——作為生存態度、現代情狀、與價值轉向〉，《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57。

²⁴ 潘國靈：〈旅行的意義〉，《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47。

2. 遊牧

潘國靈在闡述「游離」時，引用了德勒茲的「遊牧」概念，透過分析此概念，可知潘國靈在「游離」過程中對「家園」的態度。早於 2007 年，潘國靈已經察覺自己的「遊牧」狀態：

回歸十年，坊間一片回歸熱，我無意湊興，事實上，九七回歸之際，我身在倫敦，回歸十年一刻，我身在紐約，我懷疑隱伏於潛意識中，有個「我」正想方設法為自己製造「不在場」的理由。After This My Exile。但其實談不上「出走」，連放逐也不是，極其量只是遊牧。而 Nomad，如法國思想家德勒茲說：“the nomad is one who does not depart, does not want to depart, who clings to the smooth space left by the receding forest, where the steppe or the desert advance, and who invents nomadism as a response to this challenge.”²⁵

潘國靈把自己在幾次香港社會變動期間都身處異域的狀態稱為「遊牧」。引文中，潘國靈提出「出走」、「放逐」、「遊牧」三個概念。「出走」指人刻意從處身的生活地點抽身出來，希望從其他城市中找到救贖；而「放逐」則指人前往異地後沒有歸期，也沒有可折返的地方。²⁶「遊牧」可謂介乎兩者之間，遊牧者並不如「出走」者渴望離開一個地方，也不如放逐者般被迫離開一個地方。

李歐梵指出，德勒茲等法國知識分子的生活都離不開城市，尤其是巴黎，但他們對城市的論述因著文化語境不同而不能完全移用在香港。²⁷ 李歐梵因應潘國靈的實踐與香港的實況，提出「遊牧」新的定義：對於香港知識份子，以「遊」觀香港，能看到了外來者甚至「反認他鄉是故鄉」的人，並且感受到經濟、全球化對城市本土文化的壓迫；而「牧」則有為這塊「平滑空間（smooth space）」貢獻一分力量的意義。²⁸ 李歐梵結合香港語境，把德勒茲的思想重新定義，目的是肯定潘國靈拒絕把香港「理論化」，並從實踐中重新塑造香港文化的做法。²⁹ 潘國靈指自己「遊牧，而不遷移」，³⁰ 暗含了自己即使在香港社會變動中身在異地，但其「意義中心」依然在香港，並沒有遷移。《總》中，潘國靈再次引用德勒茲的遊牧，指其比流浪接近當下的時代精神。³¹ 他把遊牧者「並不離開，也不想離開」的地方定

²⁵ 李歐梵為潘國靈《城市學 2：香港文化研究》作序時，以〈遊牧精神〉為題目，並翻譯了潘國靈引用德勒茲之引文：「遊牧者並不離開，也不想離開，他執著於那片森林退縮後的平滑空間，那裏有草原或沙漠在進佔，他發明了遊牧主義，作為對這個挑戰的回應。」見李歐梵：〈遊牧精神〉，載潘國靈：《城市學 2：香港文化研究》，頁 6。

²⁶ 潘國靈：〈旅行的意義〉，《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8、20。

²⁷ 李歐梵：〈遊牧精神〉，載潘國靈：《城市學 2：香港文化研究》，頁 7。

²⁸ 同上注。

²⁹ 李歐梵：〈遊牧精神〉，載潘國靈：《城市學 2：香港文化研究》，頁 8。

³⁰ 潘國靈：〈《城市學 2》：我的十年「浮城誌」〉，《城市學 2：香港文化研究》，頁 14。

³¹ 潘國靈：〈流浪的意義，及其不可能〉，《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23。

義為「原初」，亦即他不曾離開又無可折返的地方。³² 他指遊牧者「不斷盤桓，其實什麼地方都去不了」³³，表述了其於不同地方旅行，盤桓於世界各地時，其實不能割捨他的「原初」——香港。³⁴

3. 都市浪遊

潘國靈的旅遊狀態是游離不定的，同時離不開其「原初」的地方。不論在香港抑或外地，他始終以「浪遊」的方式觀察，且所到之地全是都市。〈流浪的意義，及其不可能〉中，潘國靈直言他對城市的喜愛：

去哪裡我都沒所謂，只要是一座城市就可以了。我知道這個世界有草原、有沙漠、有高原、有戈壁，但這些地方於我有敬畏，城市於我比較親近。[.....] 有街道踴躍的地方我就可以留下，我並不需要一個恆久的據點叫家鄉。³⁵

潘國靈描述自己喜歡沉醉於城市街道中的燈光、咖啡店、便利店、演出等。而他漫遊在街道的方式，需援引班雅明「都市浪遊者」（*flâneur*）的概念說明。

十九世紀，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面對巴黎城區大幅度的拆卸、重建，感受到了都市的變化不定。他把自己置身於都市駁雜的建築以及熙來人往的人群中，將自己看作成一個英雄，從人群中離折出來。³⁶ 班雅明仔細研究波特萊爾的作品，提出「浪遊者」（*flâneur*）³⁷ 的論述。

³² 潘國靈：〈流浪的意義，及其不可能〉，《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23。

³³ 同上注。

³⁴ 潘國靈進一步申述自己的「遊牧」狀態：「遊牧，但不遷移，甚麼地方也沒去過。移居者（*migrant*），反認他鄉是故鄉，也許從來沒真正離開。留下來的，反認故鄉是他鄉。偶爾陌生感襲來，城市容顏莫辯。在停留與出走之間，更多的是飄泊、擺盪、遊離；真正的回歸不在一刻，也說不準是何時，就讓它無限延擱，那又何妨。而我竟然貪戀如斯弔詭的懸擱狀態，凡事太固定、太腳踏實地，我就開始迷惘了」可見，潘國靈不止把自己的狀態定義為「遊牧」，且眷戀著此狀態。此狀態亦見於《總有些時光在路上》的多段旅程當中。參見潘國靈：《城市學 2：香港文化研究》，頁 14-15。

³⁵ 潘國靈：〈流浪的意義，及其不可能〉，《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21。

³⁶ 曹金羽：《漫遊者與自我的起源》，《社會理論學報》第十九卷第二期（2016 年），頁 505。

³⁷ 另有中文翻譯「漫遊者」，並為廣泛使用。為方便論述，本文將取潘國靈在《城市學：香港文化筆記》中「浪遊者」的用法。

潘國靈在《城市學：香港文化筆記》中「三寫班雅明」，主題分別是「復興」³⁸、「憂鬱」³⁹、「悖論」⁴⁰，皆與其「都市浪遊」緊密關聯，流露出對「都市浪遊者」的重視。在《總》中，潘國靈進一步申述「浪遊」的意義。他描述都市浪遊人在自身的城市中不依循規範秩序地、漫無目的地浪遊，表現出一種對資本主義消極的抗衡。⁴¹然而，他們並非完全抗拒城市的五光十色，甚至有一種神迷。⁴²此外，都市浪遊人是孤獨的，但並不與世隔絕，而是浪遊於城市紛擾的人群當中，是「群眾中的人」(The Man of the Crowd)。⁴³潘國靈不止步於介紹「都市浪遊人」的特質，更把其轉化為自身的生命特質，「浪遊」於香港不同空間。潘國靈自述，他在行走時總是精神渙散，同時高度集中地沉浸於反思與內心獨白氛圍中。⁴⁴《總》所敘述的旅途中，潘國靈貫穿其在香港「浪遊」的實踐，並且揉合了「遊牧」、「游離」的態度，表現出其對旅行景點的態度以及對自身的反思。

第三節 保存與重建——香港形象之內涵

在快起快拆之下，香港的城市的風景因而不斷流動，城市的身份與影響亦因而難以言說。陳智德描述，在全球化經濟的衝擊、市區重建和土地問題下，香港的本土景觀逐漸流失，趨向「無地方性」(placelessness)。⁴⁵潘國靈關注香港城市空間變遷，在旅行途中尤其關注異地城市空間之特質，以期產生不同的衝擊，從中探索香港城市的特質。⁴⁶故此，他除觀察其日常景緻外，亦特意從日常街道浪遊至廢墟、工業空間等不同的陌生以至異質的空間，途中不斷反思香港形象之建構與消逝。

³⁸ 此章，潘國靈提到在 2004 年，香港恰巧有不同高等學院同時在研讀班雅明，或舉辦與班雅明有關的研討會、實驗活動，可稱為香港班雅明的「小復興」。潘國靈以此延伸，討論班雅明於現代香港的意義。他指出香港的街道逐漸消失，行人通道從地面上升到商場、天橋，原因是香港城市發展由政府及發展商主導，一般市民的聲音十分微弱。班雅明言巴黎是「浪遊人的應許地」(the promised land of the flâneur)，潘國靈則質疑香港是否能如班雅明所言的巴黎般適合浪遊，並指出在香港「浪遊」蘊涵對政府、發展商之「權力抗衡的象徵和實踐意義」。參見潘國靈：《城市學：香港文化筆記》，頁 5-6。

³⁹ 此章，潘國靈以「浪遊」評價班雅明的生活，認為班雅明的人生如「都市浪遊者」般憂鬱，更把自己亦定義成如班雅明一般的「憂鬱型讀寫者」。他們在藉助文字建立思想的同時自我毀滅，並且以否定來肯定自己，從憂鬱擷取力量。參見潘國靈：《城市學：香港文化筆記》，頁 9-10。

⁴⁰ 此章，潘國靈舉出都市浪遊人多個悖論，例如「他從時尚中看到死亡，從現代建築中看到廢墟，從人群中看到幽靈，從未來看到過去，從過去看到未來」等。又，他指出浪遊人常不能自拔地陷入一個人的孤獨、憂鬱、冥想中，而這種冥思出神的心靈活動卻必定依附在物質性的都市。潘國靈以此延伸到香港都市，指香港的密集而高聳的建築以及聒噪的聲音，同樣是都市浪遊人所神迷的，引入後面章節潘國靈對香港各種文化的反思。參見潘國靈：《城市學：香港文化筆記》，頁 11-15。

⁴¹ 潘國靈：〈我思游離——作為生存態度、現代情狀與價值轉向〉，《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52。

⁴² 同上注。

⁴³ 同上注。

⁴⁴ 潘國靈：〈迷城記〉，《城市學：香港文化筆記》，無頁碼。

⁴⁵ 陳智德：《根著我城：戰後至 2000 年代的香港文學》(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頁 86。

⁴⁶ 凌逾：〈與潘國靈對談錄(下)——關於跨界、消失與詩性(訪談)〉，頁 68。

（一）後工業形象之建構

香港與全球許多城市同樣處於「後工業時代」⁴⁷，當城市經濟不再依仗工業發展，已閒置的舊有工業設施便需要重建或改造。潘國靈筆下的紐約、台灣、廣州等地，都能表現出潘國靈對後工業形象的反思。

〈閒置空間再利用概論〉中，潘國靈先定義何謂「閒置空間」⁴⁸，然後說明再利用閒置空間是當今許多城市從工業時期轉入後工業時期所面對的問題。〈工業時代的舊建築重建〉中，潘國靈指出香港有許多散落於不同角落的舊工業空間，如工廠大廈、倉庫、街市、屠宰場，停用的碼頭、警局等，需要政府和民間以深遠、廣闊的視角思考適切的方法保留或改造，⁴⁹ 香港閒置空間利用的發展尚在起步階段，可借鏡於歐美地區、台灣等地比較成熟經驗與案例。⁵⁰ 潘國靈把上述兩篇文章置於第八章「文創園區」首兩篇，起全章「引言」之用，而後四篇則著重案例分析，個別介紹四個座落於不同地區的文創園區。⁵¹

在描述過程當中，潘國靈並沒有直接把這些工業改造空間與香港某些案例比較，甚至全文亦不曾提及「香港」二字。但從他遊覽目的可見，潘國靈在參觀過程中必定帶有香港本位的視野。2012年，潘國靈以藝術發展局文學顧問身份參加局方率團的文化考察之旅，走訪台北多個以閒置工業空間改造而成的文創園區。⁵² 故此，他觀察時乃帶著為香港後工業空間找尋參考對象的態度，以香港本位的視野凝視這些案例，並把其觀察視野延伸到對其他地區之文創園區的觀察。潘國靈大致肯定這些園區的規劃，例如華山文創園區能夠在保留期日治歷史故事集原有酒廠的特色以外，也成功糅合了當代文創產品消費的興趣，松山文創園區能表現出工業與自然的共生，廣州紅專廠則能平衡藝術、消閒娛樂，令其有經濟價值的同時不至於過度商業化，從中可見潘國靈對香港閒置空間使用的期待，包括能夠承傳原有歷史特色、表現出獨特的反思課題、平衡經濟收益等。⁵³

⁴⁷ 潘國靈描述「後工業時代」言：「人會退役，城市空間其實也會，尤其一些工業時代的空間產物，完成了一個黃金歲月的『歷史任務』，功成身退，或遭廢置，或遭拆毀，幸保下來的，則轉型成新的空間，在我們這個據說是講求文化創意、資訊知識的無形『後工業時代』。」見潘國靈：〈工業時代的舊建築重建〉，《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257。

⁴⁸ 根據潘國靈的描述，「閒置空間」指一個曾經有著特定用途的空間，因工業轉型，歷史變遷、都市計畫等各種原因導致其廢棄、失修等乃至多餘的狀態。賦予這些空間新角色，對城市形象以及城市再生都有重要作用。見潘國靈：〈閒置空間再利用概論〉，《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254。

⁴⁹ 潘國靈：〈閒置空間再利用概論〉，《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256。

⁵⁰ 潘國靈：〈閒置空間再利用概論〉，《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254。

⁵¹ 同章節之〈一座人文茶館〉、〈廣州紅專廠遊記〉，則是潘國靈同年到上海的紅坊作書展講座、參觀過廣州的紅專廠後所寫，潘國靈決定一併收於「文創園區」一章，當做一個專題書寫。見潘國靈：〈自序〉，《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14-15。

⁵² 潘國靈：〈旅人，不止一個〉，《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14-15。

⁵³ 參見潘國靈：〈華山文創園區〉、〈松山文創園區〉、〈廣州紅專廠遊記〉，《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262-274。

在此章節，潘國靈清晰地介紹一些大眾未必理解的學術名詞如「閒置空間」、「後工業時代」等，同時客觀地介紹園區的獨特之處，知性且簡單易讀。這些筆風與文章的發表園地息息相關。潘國靈曾在專欄《頭條日報·靈感國度》上發表《總》第七章「文創園區」中多篇文章。⁵⁴ 潘國靈言，他的專欄內容一般較公共性，以保持他與社會發展的關係，故他的專欄文章多以沒有修飾的實寫即時回應城市議題。⁵⁵ 在專欄書寫上述旅行經驗時，潘國靈亦期待引起香港大眾一同思考香港後工業空間的課題。他在〈閒置空間再利用概論〉所言之讓香港在其他地區的成熟經驗及案例中借鏡，並非紙上談兵，而是能真切地透過文字評論引發大眾的思考和關注。⁵⁶ 香港的工業時代已然過去，透過書寫異地後工業閒置空間，讓潘國靈從中吸收表現自身文化的養分，表達本地閒置工業空間同樣能夠成為表現自身歷史、文化身份的空間的盼望。

（二）自我之失落

潘國靈在遊覽途中，常思考所到之城市如何抵抗全球化劃一的發展，以繼續保留它們獨特的個性。他筆下的澳門與紐約，正從兩方面反映城市的個性，在行文中時有與香港對照。

1. 抵抗消失——澳門

潘國靈及李歐梵皆把澳門看成香港的「對照地」。在〈澳門作為香港的「對照記」〉中，潘國靈引用李歐梵〈澳門，歷史幽魂的棲身地〉，指澳門可以作為香

⁵⁴ 《總有些時光在路上》第七章「文創園區」中，〈華山文創園區〉、〈松山文創園區〉、〈閒置空間再利用概論〉、〈廣州紅專廠遊記〉曾發表於專欄《頭條日報·靈感國度》，《總有些時光在路上》的版本只稍作改動。上述四篇文章，於《頭條日報·靈感國度》分別發表為〈閒置空間再利用概論（之一）〉（2012年6月25日）、〈閒置空間再利用概論（之二）〉（2012年7月9日）、〈閒置空間再利用概論〉（2012年7月16日）、〈廣州紅專廠遊記〉（2012年9月17日）。參見潘國靈：〈閒置空間再利用概論（之一）〉，《頭條日報·靈感國度》，（2012年6月25日）<https://hd.stheadline.com/news/columns/28/20120625/195229/>（2023年3月28日瀏覽）；潘國靈：〈閒置空間再利用概論（之二）〉，《頭條日報·靈感國度》（2012年7月9日）<https://hd.stheadline.com/news/columns/28/20120709/196950/>（2023年3月28日瀏覽）；潘國靈：〈閒置空間再利用概論〉，《頭條日報·靈感國度》，（2012年7月16日）<https://hd.stheadline.com/news/columns/28/20120716/197898/>（2023年3月28日瀏覽）；潘國靈：〈廣州紅專廠遊記〉，《頭條日報·靈感國度》（2012年9月17日），<https://hd.stheadline.com/news/columns/28/20120917/205831/>（2023年3月28日瀏覽）。

⁵⁵ 黃怡、羅樂敏訪問，羅樂敏整理：〈在焚燬中的城市談創傷和堅持——韓麗珠、潘國靈的對談〉，《字花》第92期（2021年8/9月號），頁14。

⁵⁶ 潘國靈：〈閒置空間再利用概論〉，《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254。

港的「她者」。⁵⁷ 他們皆認為，在香港「快起快拆」的城市特色中，澳門對歷史建築的保留正好作為香港一面「反照」的鏡子。⁵⁸

澳門與香港的歷史相近，發展足跡卻截然相反——香港成為了高度現代化、國際化的都市，而澳門則一直安於其小城的平靜生活。潘國靈指出，成為旅遊城市（Tourist City）是所有城市在全球化紀元中立足的方法，澳門與香港同樣需要旅遊作為經濟支柱。不同的是，在香港與世界爭相興建摩天大樓，不斷拆除與建立之時，澳門選擇抽身於世界之爭，保留自己的歷史價值。⁵⁹ 潘國靈於〈澳門作為香港的「對照記」〉中多次描述澳門如何呈現出其獨特的歷史，對照香港在全球化發展的洪流中漸次失去自我的處境。李歐梵提出：「澳門可以稱得上是歷史的廢墟，目前香港看不見的、想不到的仍然存在於澳門。」⁶⁰ 潘國靈順著李歐梵的論述，指出香港的低矮樓房、老式招牌、舊式茶樓等逐漸消逝時，澳門仍然「心安理得」地保存這些事物。⁶¹ 在行文中，潘國靈不斷比較香港之「失落」及澳門之「保存」：

在這裡[澳門]，香港人可以離開自己所有的（摩天大樓、商場、令人暈眩的符號、快速的步調），來到一個「對照地」，找回自己一點失落的東西，例如街坊鄰里、歷史幽靈、閒適步調、慢活心情等。有些東西，香港曾經有過，有些東西，香港不曾有過，如南歐風情。⁶²

澳門目前所有之，亦是香港之「曾經所有」，潘國靈對於香港的現代化建築以及快速的步調感到乏味，轉而從「對照地」澳門尋找香港所失落的歷史文化、街坊鄰里等足跡，在異地流露出對香港自我失落之惋惜。

除此之外，潘國靈亦肯定澳門能把歷史廢墟轉變為文化資本，建構他們在世界中獨特的位置。他以文化研究者的視野，指出當今人們理解另外一個城市的方式已從原本的認知價值（Epistemological value）轉變為展覽價值（Exhibition value），而大三巴在此轉變下，建築的意義亦從「宗教意義」轉變為「旅遊意義」。⁶³ 前往澳門的遊人，大部分缺乏歷史意識，拜訪大三巴並非為了解「大三巴牌坊」與前身

⁵⁷ 李歐梵：〈澳門，歷史幽魂的棲身地〉，《尋回香港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05。此書乃李歐梵《尋回香港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以及《都市漫遊者》（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之合訂版。合訂版頁3至頁100原屬《尋回香港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03至頁259原屬《都市漫遊者》（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二書合訂後以《尋回香港文化》為名出版。本文之相關引文及論述，全部取自合訂版內容，以確保內容之準確性。

⁵⁸ 潘國靈：〈澳門作為香港的「對照記」〉，《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60。

⁵⁹ 潘國靈：〈從大三巴看廢墟的意義〉，《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66。

⁶⁰ 李歐梵：〈澳門，歷史幽魂的棲息地〉，《尋回香港文化》，頁105。

⁶¹ 潘國靈：〈澳門作為香港的「對照記」〉，《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61。

⁶² 同上注。

⁶³ 潘國靈：〈從大三巴看廢墟的意義〉，《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66。

聖保羅教堂的歷史，而是把其視作「拍照留念」的景點。⁶⁴ 潘國靈形容大三巴為「毀容者之新生」，認為它實際上是「一堵非常後現代的斷壁」。⁶⁵ 聖保羅在大火中毀滅，只剩下一堵斷壁，然而這堵牆壁不是承載原本聖保羅教堂的歷史，而是轉化成澳門作為旅遊城市的符碼。

在潘國靈的眼中，儘管人們並沒有足夠重視「大三巴」的歷史意義，然澳門在保留自身文化上依然是成功的，「大三巴」依然是澳門獨特的文化標誌。李歐梵指出，「一個城市往往以一個主要建築物作為它的商標，也藉著這個建築物的文化意義而聞名世界。」⁶⁶，而香港是一個缺乏歷史意識的城市，長期以來的旅遊商標是時而加上維多利亞港的夜景的一艘老式帆船，意義空泛而虛無。⁶⁷ 潘國靈透過遊歷其他城市，體悟到香港「無地方性」（placelessness）的深層原因。他指出香港時常處於與其他城市的爭奪心態，使其爭奪的外來價值不斷刺激、重構自身的身份，最終落在不斷自我定位的循環中，只能繼續使用意義比較虛無的帆船象徵自己，無法蘊涵深刻的文化意義。⁶⁸

在把香港與澳門對照的過程中，潘國靈不斷肯定澳門的「自知」、「安心」，表現出他也希望香港能如澳門般，在其他大城市「盲衝衝前」、「遇佛殺佛」的過程中，不完全喪失自我的特點。⁶⁹

2. 保存消失——紐約

澳門能夠保存自身的歷史回憶，亦能從歷史中轉化出新的文化符碼，而紐約吸引潘國靈之處，則是其保留廢墟，表現出城市曾失去的事物。潘國靈認為「觀察紐約的價值與危機，是認識自身不可或缺的」。⁷⁰ 他身為「第三個紐約」的過客，既希望在此尋求些什麼，也帶著「我城」的記憶與認知，「以她城作為鏡子反射自照」。

71

在紐約的旅程中，潘國靈尤其關注九一一事件製造的廢墟，並在〈歸零地〉⁷²、〈反省缺失〉兩文知性、敏銳地論述了遺址的意義，肯定美國政府的處理方式。

⁶⁴ 潘國靈：〈從大三巴看廢墟的意義〉，《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65。

⁶⁵ 潘國靈：〈從大三巴看廢墟的意義〉，《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67。

⁶⁶ 李歐梵：〈尋找城市的文化建築〉，《尋找香港文化》，頁 197。

⁶⁷ 李歐梵：〈尋找城市的文化建築〉，《尋找香港文化》，頁 198。

⁶⁸ 潘國靈：〈澳門作為香港的「對照記」〉，《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61。

⁶⁹ 潘國靈：〈澳門作為香港的「對照記」〉，《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63。

⁷⁰ 潘國靈：〈自序〉，《第三個紐約》，頁 12。

⁷¹ 同上注。

⁷² 〈歸零地〉的第一個版本曾收錄於《第三個紐約》「文化首都與地標」一章。潘國靈在出版《總有些時光在路上》前重寫，主要更動為結合了《第三個紐約》〈大樹墩〉的部分段落以及增添了最後一段。此外，《總有些時光在路上》「再會紐約」一章，有多篇文章都收錄在《第三個紐約》中，

〈歸零地〉寫於 2007 年，〈反省缺失〉則在寫於 2011 年潘國靈重訪紐約之時。潘國靈兩次到訪紐約，皆仔細觀察此九一一廢墟，抒發對「失去」的省思。

九一一災難後，紐約世貿中心頓成廢墟，潘國靈將其形容為「歸零地（Ground Zero）。此十六畝土地在物理上已修復，然在價值意義上卻承載著人為的災難與罪惡。潘國靈描述，世貿中心被襲時，旁邊的聖保羅教堂安然無恙，然庭園中的大樹卻被摧毀至只剩樹墩。頓成廢墟的世貿中心、樹墩、教堂，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三者並置，讓潘國靈有末段的反思：

人類歷史上，沒有一片人造廢墟如「歸零地」，是人類罪惡的活生生鐵證，同時又是人性崇高彰顯之境地。在股市被奉為聖壇的華爾街，來到這片廢墟，人們才得以頃刻思考，何謂真正的救贖——如果有的話。⁷³

在經濟發達的城市，潘國靈始終著眼於其經濟貿易以外的反思，渴望在金錢至上的年代中，從消失、廢墟中反省自身。在「歸零地」重建以後，潘國靈不能忘懷其「廢墟」狀態。潘國靈首次拜訪「歸零地」時，裏頭還是一片頹垣敗瓦，一個名為「反省缺失（Reflecting Absence）」的重建方案正在進行。2011 年，潘國靈重訪時，新世貿中心已聳立，而雙子塔原址亦已建成「九一一紀念碑」（911 Memorial），廢墟得以重生。然而，潘國靈仍對廢墟「反省缺失」狀態念念不忘，認為過去十年，此以廢墟面目示人的「歸零地」能夠讓人沉靜下來，從缺失反思生命。潘國靈特意指出，在此十年中，美國政府本可在更短時間清理頹垣敗瓦，盡快令此位於黃金地帶的土地重新成為獲取金融、經濟利益的搖錢樹。然而，政府卻讓其處於「廢墟」毫無遮掩地示人多年，才展開重建計劃。⁷⁴ 潘國靈以此與「唯經濟是命」的城市比較，認為若此事發生在該城市，此城的政客、既得利益者、淺見者必定會聲討、叱罵政府，認為此舉浪費納稅人金錢。⁷⁵ 他指出，此經濟單向維度的地方，沒有人明白廢墟的意義。⁷⁶

縱然潘國靈沒有明言此城所指，但也不難推論他指的正是香港。在〈反省缺失〉後半部分，潘國靈仔細描述「九一一紀念碑」下沉的特質，認為物理的下沉能有效提醒遊人已經消失的事物，讓這裡的創傷、缺口不至於被城市發展掩埋。在近五年，潘國靈多種作品皆以「消失」為主題，包括 2017 出版的散文集《消失物誌》以及長篇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前者借紀錄城中消失中的小物件、地方、行業、食

包括〈第三個紐約〉、〈獨立電影院〉、〈洛克斐勒中心〉、〈Elliot Tiber——「石牆事件」見證者〉、〈表象就是真相之安迪·華荷〉、〈屬於紐約和歐洲的蘇珊·桑塔格〉、〈從卜·戴倫，看一個「小波西米亞」〉、〈歸零地〉等，並且散落在《第三個紐約》不同章節。

⁷³ 潘國靈：〈歸零地〉，《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191。

⁷⁴ 潘國靈：〈反省缺失〉，《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193。

⁷⁵ 同上注。

⁷⁶ 同上注。

物等，希望借書寫保存終會消失滅絕的事物。⁷⁷ 後者則以「沙城」隱喻香港，描述香港如沙般逐漸消逝的特點，蘊含哲學、美學、社會學等多方的複雜涵義。⁷⁸ 可見，潘國靈對逐漸消逝的事物感到惋惜，自身則透過寫作以抵抗不留痕跡的消失，賦予城中的「消失」更深刻的意義。而上述的旅行經驗，正能夠激盪潘國靈對「消失」的反思，並把此反思帶到其他創作，延伸到他對香港的書寫。

（三）小結

綜上所見，潘國靈認為歷史文化以及消失的痕跡皆是構成城市身份重要的元素。艾倫·狄波頓言，旅人看重之異國特質。往往是故土不能做到的，在異國發現情調往往是旅人在本土求而不得的事物。⁷⁹ 也斯則指出，平常人們囿於自己有限的生活經驗，甚少有外來的經驗刺激他反省自身。旅行則提供養料使人反省欠缺，進一步充實自己。⁸⁰ 潘國靈自言從反命題切入原有的議題將會有新的助益，⁸¹ 他的筆下的澳門、紐約之得正是香港之失，包括澳門之具歷史足跡與街坊情味的舊有生活模式，以及紐約在高速發展下曾經保留的沉思空間。

潘國靈離開了所依附的本鄉，以文化觀察者的眼光「遊」於各城，尋找「牧」於本土的養分。潘國靈曾言：「性格使然，我不是舉拳頭、喊口號的人。我求索於文字，切入同時抽離。」⁸² 上述的例子皆能顯示出，潘國靈在觀察所到的城市時，情感上頗為抽離他所關注之城，以冷靜、客觀、知性的文字描述異地，切入他關注的香港議題。

第四節 接受與表述——香港身份之建構

潘國靈的旅行甚少跟隨既定的旅遊秩序前往城市最著名的景點，而是浪遊於城中的大街小巷，敏銳地分辨城中的不同特點。即使身處著名的旅遊景點，他亦疏離於現場的氣氛文化。此種旅遊狀態令他對異地的省思不被論述中心所限制，從而發現當中邊緣的、被忽略的城市身份。下文將闡述潘國靈對城市身份表述策略的觀察，分析他如何從中思考香港身份的接受與表述。

（一）文化符號粗俗化⁸³

⁷⁷ 潘國靈：《消失物誌》（香港：中華書局，2017年），頁11。

⁷⁸ 凌逾：〈與潘國靈對談錄（下）——關於跨界、消失與詩性（訪談）〉，頁68。

⁷⁹ [英] 艾倫·狄波頓著，南治國、彭俊豪、何世源譯：〈異國情調〉，《旅行的藝術》（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頁76。

⁸⁰ 也斯：〈旅程與文學〉，《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頁125。

⁸¹ 潘國靈：〈旅行的意義〉，《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47。

⁸² 潘國靈：〈我的十年「浮城誌」〉，《城市學2：香港文化研究》，頁17。

⁸³ 潘國靈在〈舊都與新城〉一文，潘國靈把過度旅遊發展、追求各種城市名目、評分的舉動形容為「粗俗化」，本節取用「粗俗化」的用語，闡述現代發展使城市文化變得凝滯而失去活力的過程。

潘國靈遊至杭州、紹興等地，感受到這些地方的文化符號多因追求商業收益而生成，結果壟斷了城市的詮釋空間。⁸⁴ 由於商品需要固定的商標方能吸引觀光客，一旦文化成為了被兜售的賣點，本來流動而有生氣的城市文化便會變得凝滯。潘國靈目睹各地城市為迎合消費市場需要和國際組織評分準則而不斷形塑、改造自己，惋惜它們原本獨特的身份最後因服膺於預設的框架而不免變得粗俗。⁸⁵ 例如杭州政府為追求旅遊經濟利益，把杭州絲綢、建築、茶道等傳統精緻生活文化改造成現代化酒店、國際名牌，使潘國靈感嘆即使杭州本來比較多的「抵抗粗俗化的『抗體』」，也不足以抵抗上述粗俗化的現代發展。⁸⁶ 杭州的歷史文化身份更值得珍重的意涵，終因迎合現代化發展以及旅遊經濟效益失落。

除了被消費主義掩埋了城市獨特的特質外，過於強化城市某些歷史文化符號同樣損害城市的特性。文化符號原能協助他人了解城市身份，但一旦過於強調某個符號使其成為中心，便會令城市失落圍繞符號邊緣的特質。紹興以「東方威尼斯」以及「魯迅」作為自身的文化符號，當政府過度使用它們宣傳紹興時，最終令「東方威尼斯」之旅遊水鄉符號侵佔了紹興居民的生活空間，⁸⁷ 「魯迅」之符號掩蓋了同樣出身於紹興的王羲之、陸游、徐錫麟、秋瑾等名士的光芒，⁸⁸ 紹興的身份終被自身的文化符號所壟斷。

潘國靈「遊」於異地，其省思始終不離香港。陳智德音，二千年代的香港本土性問題，對應的是「帶著美好生活和消費包裝下的全球化市場暴力」。⁸⁹ 潘國靈的作品不乏對全球與香港本土文化的論述。⁹⁰ 身在異地，他依然帶著對本土所關注

見潘國靈：〈城市名目〉，《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200-202；潘國靈：〈舊都與新城〉，《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203-205。

⁸⁴ 郭少棠指出，被旅遊者為了迎合旅者的喜好，或會不惜把自己的文化肢解出售。當旅遊者沉醉在為了迎合其需要而產生的文化活動中，被旅遊者真正的文化同時隨之消失。杭州、紹興等地亦表現出此文化肢解的情況，使潘國靈有「文化符號粗俗化」的感悟。見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68-69。

⁸⁵ 潘國靈：〈城市名目〉，《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202。

⁸⁶ 潘國靈：〈舊都與新城〉，《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205。

⁸⁷ 潘國靈：〈紹興：歷史主體化〉，《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218-219。

⁸⁸ 潘國靈：〈虛實交集的「魯迅故里」〉，《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223。

⁸⁹ 陳智德：《根著我城：戰後至 2000 年代的香港文學》，頁 66。

⁹⁰ 如有專著《城市學：香港文化筆記》及《城市學 2：香港文化研究》，論述香港的流行文化、文化背後的權力結構、疾病隱喻等課題。單篇論文則有〈「本土」的十年變化〉，潘國靈從「九七前」、「後九七」、「後沙士」、「後皇后」、「後高鐵」五個階段，順序闡述香港「本土性」的變化。參見潘國靈：〈「本土」的十年變化〉，載朱耀偉主編：《香港研究作為方法》（香港：中華書局，2016 年），頁 252-261。

之議題，表述對迎合經濟、旅遊等文化符號損耗本地文化的惋惜。緊接上述旅程，潘國靈在其北京之旅實踐出對上述文化符號粗俗化的抵抗。⁹¹

在北京，潘國靈浪遊於街道與小巷之間，仔細觀察了北京市內廣告招牌、發展商活動所表現出的香港形象。不論是否香港公司，它們皆以香港藝人為代言人吸引消費者。而香港公司更會強調自己的香港身份，以「香港名牌，香港直銷」之類的標語作招徠。〈時尚香港在三里屯〉一文中，潘國靈描述在三里屯 Village 舉辦之「時尚香港@北京大集」匯聚超過六十個香港品牌及原創設計，當中主要是鐘錶、珠寶一類的商品，可見內地對於香港的想像大多與香港的經濟、商貿發展息息相關。⁹² 在 2011 年的北京，人們對香港的印象已簡化成一種「高尚」、「信心」的資本主義符號。

潘國靈並沒有駐足表現出「商業化」香港形象的環境，轉而尋找北京城內呈現出的其他香港形象。這些文化特色未經「符號化」，仍具有原本的活力與流動性。他認為「時尚香港@北京大集」中珠寶、鐘錶一類象徵資本主義的商品「於我有隔」，⁹³ 轉而前往「從香港北上」的庫布里克 (Kubrik) 書店。⁹⁴ 他肯定此種結合百老匯影院與書店的營運模式，同時惋惜香港欠缺容納這些多元、充滿人文氣息咖啡店的空間。他在異地二度提及這所咖啡店，顯示出他於異地對香港人文氣息的尋索。在音樂方面，潘國靈特意指出香港非主流組合 My Little Airport 曾在北京演出，又以「赫然」描述自己在「光合作用」書店聽到其音樂作品時的感受。⁹⁵ 潘國靈以「隨意率真」形容 My Little Airport，正可與上述廣告、商業市集刻意表現出的香港形象對照。⁹⁶ 綜合庫布里克 (Kubrik) 書店與 My Little Airport 兩個例子，可見潘國靈竭力以自己的旅行及書寫呈現出香港文化非商業一面，對抗異地把香港形象凝滯成「商業信賴」的符號。

潘國靈始終貫徹其「浪遊」的方式，遊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之間，對抗官方與大眾對城市形象符號「粗俗化」的表述。李歐梵描述都市浪遊者「終日無所事事，閒遊街頭，而於散步之間在腦海捕捉都市中的形象。」⁹⁷ 潘國靈的浪遊過程縱然並無清晰的目的，但在漫無目的下，他並非純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而是能夠投入城市的一磚一瓦，把所到之地、所見之物聯繫到對自身身份的反思。他目睹原本具

⁹¹ 上述描寫杭州、紹興的文章寫於 2011 年 7 至 8 月。同年，潘國靈帶著於兩地積累的文化省思前往北京，於 10 至 11 月寫下了多篇描繪北京的文章，從時序可推測，杭州、紹興之旅的觀察對潘國靈在北京的反思有一定影響。「寫在北京」七篇中，以〈時尚香港在三里屯〉、〈在北京遇見香港〉、〈北京咖啡店遊記〉三篇對香港的反思最為深刻。

⁹² 潘國靈：〈在北京遇見香港〉，《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235。

⁹³ 同上注。

⁹⁴ 同上注。

⁹⁵ 潘國靈：〈在北京遇見香港〉，《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237。

⁹⁶ 同上注。

⁹⁷ 李歐梵：〈都市漫遊者〉，《尋找香港文化》，頁 258。

有文化特色的城市因現代發展而變得粗俗化時，更加警惕他者對香港身份的表述。當看見他者把香港固化成商業形象時，他轉而遊走於被忽略的景觀中，以另一個角度觀察異地中的香港。可見，「浪遊」乃潘國靈思考異地文化的模式，也是他抵抗的城市符號「粗俗化」的行動。

（二）書寫之可能

潘國靈多年來持續書寫香港處境。2007年，潘國靈以「香港作家」的身份前往愛荷華參與「國際寫作計劃」，與各國作家交流，過程中產生許多對自我表述的反思。在參與計劃之前，潘國靈時常感到書寫的孤獨，他如此表述香港文學作家的處境：

在香港的文化環境中，文學作家常常都是無主孤魂，也不一定特立獨行，只是乏人問津。我習慣於位處邊陲，因而也時時感到自由，連隨一點虛空。⁹⁸

在無人注視的環境中，潘國靈縱然感受到不被外在目光框限、任意寫作的自由，但「乏人問津」的虛空依舊縈繞，可見他對獲得關注的渴望。「國際寫作」計劃讓潘國靈與世界各地三十多位作家密集相處，當中不乏同樣處於邊陲的作家。⁹⁹他把計劃描述成「不可能的夢」，言「一粒麥子落在地上，結出許多籽粒來。我剛巧拾了一粒，或成了一粒，於此時此刻。」¹⁰⁰在計劃中，他形容自己是許多籽粒的其中一粒，與引文「無主孤魂」的孤獨對照，可見計劃讓潘國靈獲得了溝通的機會。在大約三個月的旅程中，潘國靈自言感受最大的是文化衝擊，讓他從中反思了許多文化身份的意識問題，他認為「『國際寫作計劃』中的每一個作家都是個體，但當聚集起來，便必定帶有更多語言、文化歷史、政治等因素」。¹⁰¹下文將從語言、文學兩個層次闡述潘國靈對香港文化身份的反思。

1. 語言

參與「國際寫作計畫」的作家來自五湖四海，使用的語言十分複雜，包括阿拉伯語、馬爾他語、希臘文、海地語等較少人使用的語言。潘國靈曾在訪問中言：「作為香港作家，如何言說個體、自身的文學及文化，常常不僅是英語能力的問題，而必然牽涉一定的『失語症』。」¹⁰²潘國靈當下的「失語」，令他反省香港文化身份與語言的關係：

⁹⁸ 潘國靈：〈愛荷華的夢〉，《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117。

⁹⁹ 潘國靈：〈愛荷華的夢〉，《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115-116。

¹⁰⁰ 潘國靈：〈愛荷華的夢〉，《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116。

¹⁰¹ 凌逾：〈與潘國靈對談錄（下）——關於跨界、消失與詩性（訪談）〉，頁67。

¹⁰² 同上注。

幸或不幸，我們有了英語，世界的共通語言，你明知權力運行其中，但你有溝通的慾望，那就只能征服英語，或被英語征服。你看到一些作家吃力地吐出英語，你忽然感激自小接受的殖民地教育——老牌的聖公會中學，在二十年後，讓你在他城少吃了一些苦頭。¹⁰³

潘國靈認為英語為香港提供了一個與外界溝通的渠道，讓香港身份較容易被世界認知，此乃香港的優勢。潘國靈同時認為此優勢是「不幸」的，原因是英語並非普遍香港人的母語，難以表述香港獨有的文化特質，在使用他者語言敘述自己的故事時，不免製造誤解。¹⁰⁴ 在計劃中，潘國靈目睹海地作家談及海地語時哭泣，¹⁰⁵ 菲律賓與印度作家不以母語而使用英語書寫，讓他想起自身的母語。

史書美指出，只有一種官方語言的國家，國內的其他語言便會成為「方言」，被排除在正統之外。¹⁰⁶ 即使是多元官方語言的國家或地域，不同官方語言的使用頻率、獲重視的程度同樣會演變各種霸權的爭鬥。¹⁰⁷ 香港多年的法定語言是中文和英文，而人們日常最常用的粵語卻沒有正規入文，一直是依附在「中文」的口語，並無官方正統地位。就語言的官方性而言，香港的「粵語」處於邊緣位置。然而，就普遍性而言，香港人日常溝通的語言一直是粵語，粵語的主體性一直沒有失落。潘國靈慶幸粵語在多年殖民統治下不曾消失，並且為其比「國語」更加悠長久遠而感到自豪。在與各地作家交流中，潘國靈把香港的身份認同連繫到語言，一旦使用非母語的英語敘述自己，終究無法避免地失真。相比之下，「邊緣」的粵語則更能體現出香港身份。香港的自述雖然不被國際重視，幸而一直能夠保持以粵語溝通的語言身份。

2. 文學

誠然，在潘國靈自身的寫作中，也甚少以粵語入文，而是依從香港「言文分途」的系統，大致以語體文寫作。¹⁰⁸ 母語是表述自身故事最佳媒介，然人們仍然需要跳出語言的限制，才能與其他語言使用者溝通。「國際寫作計劃」讓潘國靈同時置身於多個語言之中，讓他感受到溝通之困難。正是如此，潘國靈感受到文學作為世界語的力量。

¹⁰³ 潘國靈：〈愛荷華的夢〉，《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117-118。

¹⁰⁴ 潘國靈：〈愛荷華的夢〉，《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118。

¹⁰⁵ 海地語乃海地絕大部分人口的母語，但在國際上卻極少人懂得，與粵語的處境相似。

¹⁰⁶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頁165。

¹⁰⁷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頁166。

¹⁰⁸ 陳智德描述，港人日常生活時以粵語溝通，寫作時則使用粵音唸誦的書面語，漸次形成香港口語（粵語）與書面語「言文分途」的系統。潘國靈眾多作品亦大致依此系統寫作，即使以粵語入文亦只是隻言片語，作品依舊主要以語體文（書面語）建構。見陳智德：〈香港故事依舊難說〉，《這時代的文學》（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頁 169。

潘國靈言：「政治力量、國土邊界把作家打成離散的遊魂，文學成了一塊強大的磁鐵，奇蹟般地把離散的凝聚起來。」¹⁰⁹ 潘國靈原屬「離散的遊魂」之一，以「無主孤魂」的狀態持續寫作。¹¹⁰ 縱然其母語仍有活力，但依然是自成一角，未能有效與外界溝通，以表述自己的故事。計劃讓各國作家聚首，各自不再處於「離散」的狀態，然語言依然是彼此溝通的障礙。潘國靈言，在如大牢房的語言中，「唯一共通的語言是文學」。¹¹¹ 然而，文學必須透過語言表述，上述看法似乎帶悖論性。潘國靈並沒有進一步解釋，轉而描述他在愛荷華參與的各種文學與文化活動，當中不論作家、學生等人皆渴望了解對方的文學。有人即使不明白對方的語言，也希望聽見對方用自己的語言朗讀作品。可見，文學超越於上文提及的政治力量、國土邊界，創造出一種溝通的渴望。羅貴祥指出，環球化使文化及文學越趨標準化、一體化，本土的特殊性反而成為了一種甚有市場、奇貨可居的商品。¹¹² 環球化的獵奇目光提供了本土與環球對話的可能，但兩者仍因力量懸殊而無可避免地導致本土被環球蠶食。¹¹³ 「國際寫作計畫」以「文學」聚集作家，既提供了溝通的平台，同時避免了本土與環球不平等的位置。文學並無如官方文字般執定的描述，也沒有權力的爭奪，彼此皆能以比較純粹、開放的態度聆聽對方。故此，文學對潘國靈而言，不僅僅是作品本身，更是一種不帶國族、政治偏見地溝通的態度。

可見，潘國靈於愛荷華的旅程中，在與多個作家共同交流的激盪下體會出香港文化身份「邊緣而有活力」的一面，亦由原本孤獨的書寫狀態體會到文學作為「世界語」的價值，肯定自己能夠以文學表述身份的力量。

（三）小結

上述北京之旅，潘國靈大部分時間於酒店內閉關寫作他的長篇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時而遊走於北京的胡同和街道。¹¹⁴ 洛楓形容《寫托邦與消失咒》

¹⁰⁹ 潘國靈：〈愛荷華的夢〉，《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116。

¹¹⁰ 潘國靈：〈愛荷華的夢〉，《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117；香港文學作品中不乏對「離散」的描述，呈現出香港作家「失根」的憂慮與無力，當中不但包括「根」不在香港的外來作家，更包括香港的成長者。陳智德把香港成長者的「無力」歸納成兩種，第一種是城市經驗與本土文化的割裂，令人無法在不斷變遷的城市中建立自我，第二種乃宏大敘述對地方意識、庶民角度歷史的遮蔽，令本土及平民的聲音無法進入敘述權力。潘國靈所謂的「無主孤魂」，除了表述文學在社會中不被重視的情況，同時亦表達了作為在香港成長的作家，於尋索、書寫自我過程中感到的困難與無力。旅途中必須表述自己的處境，令潘國靈能暫且放下在本鄉寫作時的孤獨與無力，嘗試有效地與外界溝通、表述自身。見陳智德：《根著我城：戰後至 2000 年代的香港文學》，頁 87-88。

¹¹¹ 潘國靈：〈愛荷華的夢〉，《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119。

¹¹² 羅貴祥：〈本土與他性的再想像〉，載梁秉鈞、陳智德、鄭政恆編：《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1 年），頁 173。

¹¹³ 羅貴祥：〈本土與他性的再想像〉，載梁秉鈞、陳智德、鄭政恆編：《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頁 176。

¹¹⁴ 《總有些時光在路上》多篇作品，都能夠與潘國靈其他作品的創作歷程扣連。除了上文提及之第七章「寫在北京」與《寫托邦與消失咒》外，亦有〈澳門雜憶，從此到彼〉、〈玫瑰堂裏的禱語〉與《事到如今——從千禧年到反送中》等。二者對照，能夠有效協助分析潘國靈旅行時的狀態。《總有些時光在路上》篇章撰寫時間與其他作品發表時間的對照，詳見附錄二。

中的沙城（香港）是一座「逐漸腐化、風化而消失的城市。」¹¹⁵ 帶著寫作時對香港的哲思，潘國靈在北京城內亦實踐了對香港文化消失的抵抗。在美國「愛荷華之旅」，他亦帶著香港書寫者的視野與眾多作家交流，從中思考香港表述自己的問題。他的作家身份，有助他在異地建構對自我表述的省思。

第五節 流放與療癒——香港認同之重塑

2019年，潘國靈經歷了個人生命傷痛以及反送中運動交疊的時刻。¹¹⁶ 《總》中有幾篇寫於2020至2021年，描述了他在創傷後重塑自己的過程。旅行至異地是他抽離創傷的方法，而在旅行過後一至兩年書寫旅途則是第二重抽離。旅行讓潘國靈獲得抽離日常生活，重新整理自己的思緒的空間；在書寫過程，他又能再次拾起旅行所得的省思重塑破碎的自己。下文將以「情感流放」以及「身份沉思」兩方面論述他如何在旅行中重塑自己的身份。

（一）情感流放

潘國靈言是反送中運動把他從私密的傷痛中抽離出來，讓他投入以寫作紀錄運動的狀態，暫且離開私密的傷痛。¹¹⁷ 然而，在他竭力理性地書寫城市的破碎與殘缺時，心中因城市創傷而生情緒便持續被壓抑著。旅行讓他在一個陌生的國度中，脫離日常的生活軌道，積聚在心中難以抒發的情感便可以得到釋放。潘國靈在《總》的序中自述：

在旅程中走出生命的難關，心有所繫若有所思，去到哪裡，其實都是情感流放之地。[……]不敢輕言治療，只能說逐漸撥開迷霧，鏹鏹變成游絲，旅行沒魔法但旅行在當中有其角色。¹¹⁸

帶著創傷踏上旅程時，旅行便帶有抒發情緒和療癒創傷的目的。潘國靈帶著創傷的鏹鏹啟程，心中仍沉溺在傷痛中，但由於旅行中的時間尤其珍貴，又使潘國靈有動力走到街道之中，在行走途中治療創傷。¹¹⁹

¹¹⁵ 洛楓：〈極端生命的殘酷閱讀——潘國靈與他的消失角色〉，載潘國靈：《寫托邦與消失咒》，頁7。

¹¹⁶ 潘國靈：〈序——事到如今，邊緣回望〉，《事到如今，從千禧年到反送中》，頁11。

¹¹⁷ 潘國靈如此表述自己在反送中運動中的狀態：「某程度是反送中運動『救』了我，在我沉溺於傷痛之時，反送中運動或多或少把我拔出來，令我重新執起筆來寫，並且寫一些不可收拾之勢。」見潘國靈：〈序——事到如今，邊緣回望〉，《事到如今，從千禧年到反送中》，頁11。

¹¹⁸ 潘國靈：〈旅人，不止一個〉，《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15。

¹¹⁹ 潘國靈言：「若說旅行關乎自由的嚮往（有時也不無幻象），在路上，我也曾帶著鏹鏹去旅行，人出走了但仍在逃與困之間，但人在異地，一天就是一天，鎮日頹廢格外感到暴殄，於是蹣跚而行，也慢慢走出一片風景來。」見潘國靈：〈旅人，不止一個〉，《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15。

〈玫瑰堂的禱告〉通篇側重的並非澳門玫瑰堂的特色或歷史，而是潘國靈自身因創傷而衍生的種種情緒與哲思。他描述自己站在聖母像面前時，「心之病、靈魂之痛，更無形無特效藥可醫，因此更難治癒。」¹²⁰ 他把聖母像當作傾訴的對象，把自己一切的愁思都傾注出來。此種傾訴，原則上任何宗教場所，甚至任何空間都能進行，不必旅行至其他地方。然對於潘國靈而言，正因異地於傷痛所發生的地方有距離，才能讓他能夠遠離聒噪，整理自己的思緒。在二樓的「憂苦之母」面前，潘國靈一連叩問多個問題。他從殘破的「憂苦之母」聯想到自身的破碎，再延伸到對「美」與「醜」的叩問。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中，潘國靈目睹某些價值觀在運動中逐漸崩解，落入對價值、語言的質疑。潘國靈把社會運動衍生的複雜的語言比喻成「一個錯綜複雜的蜘蛛網」，並感嘆「我嘗試解開不知是否不自量力」，並質疑自己分析的意義，叩問「即時能理出一點頭緒這有意思嗎於此時此刻分析是否太過抽離？」¹²¹ 他後來描述當時的情況道：「社會的分化、兩極化的身份認同，像一個軀體被撕開兩邊。」¹²² 潘國靈感受到語言的複雜性，即使他竭力嘗試分析運動中的語言，依然認為難以用語言或已有的價值判斷是非，社會撕裂、分化的現狀沒有因而變得清晰。

〈運動語言之蜘蛛網結〉寫於 2019 年 11 月 29 日，兩個月後，潘國靈帶著社會撕裂與運動語言之複雜性的記憶寫成〈玫瑰堂的禱告〉。在對「憂苦之母」的叩問中，他把如善良、邪惡，強悍、柔弱，破碎、完整，幻想、真實等二元對立的詞組放在一起，一一叩問這些是否都是美的所在。誠然，潘國靈的叩問最終都未能從「憂苦之母」中得到答案。旅行的意義在於給予潘國靈一個可傾訴的空間，這些生命疑問的碎片本存在心中，在叩問之後則能更清晰地看見他們完整的圖像。最後，潘國靈為這些問題總結：「如今明白，熱情（passion），就是受難的意思。」¹²³ 他之所以對生命、美醜有如此多疑問，是因為他對內在的生命以及外在的世界依然有著熱情，而這些熱情必然伴隨經歷生命劫難、目睹世界改變的痛苦。在讓自己的情緒流放之後，他明白到熱情與受難的一體兩面，重拾力量面對自己的劫難。

（二）身份沉思

「渡劫之行」一章的遊記充滿潘國靈各種生命創傷的印記。潘國靈表述：「這年[2019 年]城中風風雨雨，心繫我城，但生命遇著創傷，創傷也成出走的契機。」¹²⁴ 在出走的過程，潘國靈對香港身份的省思貫穿其中。鄭思珩評論《總》言：「不論我們逃到何處，創傷似乎都是每個城市必然會面對的，只是旅人的身份讓我們得

¹²⁰ 潘國靈：〈玫瑰堂裡的禱語〉，《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83。

¹²¹ 潘國靈：〈運動語言之蜘蛛網結〉，《事到如今，從千禧年到反送中》，頁 395。縱然潘國靈對運動的語言分析感到迷惘，依然在篇中努力剖析運動衍生的不同概念。

¹²² 黃怡、羅樂敏訪問，羅樂敏整理：〈在焚燬中的城市談創傷和堅持——韓麗珠、潘國靈的對談〉，頁 18。

¹²³ 潘國靈：〈玫瑰堂的禱告〉，《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87。

¹²⁴ 潘國靈：〈旅人，不止一個〉，《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15。

以稍微從中抽離。」¹²⁵ 潘國靈透過旅行抽離於創傷之地，他書寫這些經歷時亦事隔一至兩年，呈現出來的文字經過了空間與時間兩重的遠離，使文章能抽離城中複雜的事態發展，並借其他地方的歷史反思其對「我城」的情感。

〈伴離之旅〉、〈河內之行〉與〈西貢之約〉三篇分別描述 2018 年底、2019 年中、年底三次旅程，分別是香港社會運動尚未發生、發生之初，以及後來一發不可收拾之時，潘國靈的關注漸次由自己的愛情創傷，轉移到對城市的反思。三篇的題目語法結構相同，而第三篇的「約」之意義又明顯不同於第一、二篇的「旅」及「行」。在〈西貢之約〉中，潘國靈帶著城市的創傷，更深刻地感受到越南的歷史，從中尋得重塑自己的養分。下文將細讀〈西貢之約〉，析述潘國靈在旅程中如何透過了解越南近代歷史及當代發展，拾起香港的身份碎片。

潘國靈近年著重書寫緬甸、越南等中南半島國家，並特意指出他們與香港相似之殖民、共產黨背景。¹²⁶ 越南是上世紀末難民的發源地，而當時的香港則常擔當起接收越南難民的角色。二者的命運，甚少人並置比較。2019 年下半年的社會運動對香港是一場劫難，相關記憶讓潘國靈在遊歷過程中更容易找到越南與香港的共通之處，產生對自我的省思。綜合全文，潘國靈對「消失」的惋惜與擔憂貫穿於整個旅程。2017 年出版之《消失物誌》、《寫托邦與消失咒》對「消失」的描寫側重於呈現出消失的過程，潘國靈對消失中的事物並沒有竭力挽回、保留的態度，只是期望透過書寫留下這些事物的意義。然而，在〈西貢之約〉中，潘國靈多次表現出對已消失、消失中的歷史之惋惜，比前兩部以「消失」為主題的作品多了一份「保留」的期盼。

目前越南正處於高速發展的時代，過去戰爭、殖民的血淚史漸次在政府、民眾對未來美好的願景中被遺忘。潘國靈在參觀胡志明市立博物館後，感嘆「我們聽的故事不少都是經化約的」，當中消失的部分只能透過聽者自己填補。¹²⁷ 在參觀過戰爭相關的景點後，潘國靈感受到當日的血淚在時間洪流下已轉化成越南的文化及旅遊資本，民眾對於戰爭歷史的感情十分疏離。潘國靈感嘆「曾經慘烈流血的，經歷時間都變得輕於鴻毛。」¹²⁸，又言「當年的殺戮心腸，今天的旅遊勝地，一

¹²⁵ 鄭思珩：〈旅行作為生命隱喻·潘國靈首部遊記【新書推介】〉，《文化者 The Culturist》（2022 年 4 月 4 日），<https://theculturist.hk/2022/04/文化/閱讀/旅行作為生命隱喻-潘國靈首部遊記《總有些時光在/》>（2023 年 3 月 25 日瀏覽）。

¹²⁶ 黃怡、羅樂敏訪問，羅樂敏整理：〈在焚燬中的城市談創傷和堅持——韓麗珠、潘國靈的對談〉，頁 16。

¹²⁷ 在潘國靈參觀的過程中，導遊指出博物館原是越南華僑富商黃文華的大宅，他介紹黃氏家族在越南發跡、發展，逐漸成為西貢首富，並且熱心公益的故事，但卻沒有提及黃氏族人在 1975 年後全部遷移他國的原因。潘國靈在文中補充，越南解放後，黃氏家族的古董、匾額等物件被越共政府充公，而這些故事細節並不會從導遊或一般旅遊書中得知。故有「我們聽的故事不少都是經化約的」、「歷史斷裂處處」的感嘆。詳見潘國靈：〈西貢之約〉，《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317-318。

¹²⁸ 潘國靈：〈西貢之約〉，《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324。

一切都成歷史反諷，一切都成了 tourism。」¹²⁹ 可見，潘國靈對歷史感受之消失感到惋惜。現代人距離戰爭較遠，七十年代出生於香港的潘國靈本從未經歷過戰火歲月，然香港 2019 年的社會運動令他對戰爭歷史更為同情，故對越南這些景點的異化也尤有共鳴。

此外，潘國靈亦借湄公河抒發了他對消失的感嘆。湄公河流經老撾、柬埔寨、越南多個國家，歷史文化悠遠流長，亦一直澆灌著沿途國家的許多生命與文化。在遊覽之時，潘國靈聽聞湄公河在各國的現代發展下，有著消失的危機。他嘆息：「人的造化、地緣政治的作弄，有本事毀自然於瞬間。」¹³⁰ 在前往越南之前的幾個月，潘國靈目睹城中正竭力抵抗某些價值的消失，他在湄公河之命運中照見出自己，為她或會消失的命運感到惋惜，同時也寄願她在地緣政治與人為的傷害中仍能繼續保存。

文末，潘國靈言「西貢這個地方，如果有命，我是必會再來的。來的時候，但願湄公河別來無恙，等著我。」¹³¹ 〈西貢之約〉之文題，「西貢」能表述其漸次被淡忘的殖民歷史，「約」則表現出潘國靈的期許。旅程中，潘國靈在命運甚少與香港相提並論的越南找到共鳴。不論是香港抑或越南，所面對的同樣是歷史於城市發展、政治變化的過程中逐漸被遺忘甚至消失，形成人們自我認識的斷裂。在旅行結束時，潘國靈期待與帶有歷史身份的「西貢」以及承載千年歷史、多國文化的湄公河再會，隱含著對保存香港歷史文化的期許。

（三）小結

潘國靈心懷城市創傷之沉重而複雜的情緒旅行，往往會把自己深刻的感情傾注在旅行地。此時的潘國靈，大抵已放下他日常的文化觀察者、作者的目光，素面沉浸在旅行地中，讓旅行地成為承托他的情緒的空間。過程中，潘國靈從異地相似的沉重命運中，拾獲並重塑面對香港歷史斷裂、身份消失的力量。

第六節 結語

《總有些時光在路上》作為潘國靈首部旅行散文結集，表現出他從 2003 年至 2021 年總共十八年透過旅行尋索香港身份的過程。潘國靈旅行時所交疊的不同角色，讓他能更敏銳地透過異地思索香港。綜合上文，潘國靈的觀察角度大致可整理成三種：一、文化評論者。在此視角下，他較能抽離自身情感，客觀、冷靜地對照異地與香港，表述出香港之所欠缺。二、作者眼光。潘國靈多部作品皆圍繞香港，希望以文學創作書寫香港故事。故此，他在旅途中特別關注異地對香港的表述，以

¹²⁹ 潘國靈：〈西貢之約〉，《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326。

¹³⁰ 潘國靈：〈西貢之約〉，《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329。

¹³¹ 潘國靈：〈西貢之約〉，《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頁 330。

及自身在異地表述自己的各種困難。以此角度，潘國靈能夠把旅行經歷連繫到自身的寫作經驗，從行動、語言、文學等角度思考香港主體之建構。三、旅人的眼光。在此眼光中，潘國靈大致放下自己文化評論者、作家等不同角色與責任，素面遊覽所到之地，把自身的情緒扣連異地之文化歷史，生出對香港身份的寄願。

上述三種目光側重點有異，貫通的是潘國靈始終站在遠離中心的位置，浪遊於異地各著名景點、閒置空間、廢墟、大街小巷中，尋找與主流不一樣的城市形象，從中思索香港身份。大眾以「商業都市」作為香港的中心形象，潘國靈所尋索出的香港文化則多為遠離中心、不被注目的。他並非要以這些原本或處於邊緣的香港文化重新定義香港身份，而是要讓這些邊緣的特質重新進入大眾的視野，從中獲得表述的可能。

正文字數：15956 字
全文總字數：30403 字

參考書目

一、作者專書（時間先後序）

1. 潘國靈：《傷城記》，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
2. 潘國靈：《城市學：香港文化筆記》，香港：Tomart Limited，2005年。
3. 潘國靈：《城市學2：香港文化研究》，香港：Kubrick，2007年。
4. 潘國靈：《第三個紐約》，香港：天窗出版社，2009年。
5. 潘國靈：《第三個紐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6. 潘國靈：《寫托邦與消失咒》，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7. 潘國靈：《消失物誌》，香港：中華書局，2017年。
8. 潘國靈：《離》，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9. 潘國靈：《事到如今，從千禧年到反送中》，香港：Kubrick，2021年。
10. 潘國靈：《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香港：明窗出版社，2022年。

二、其他專書（姓氏筆畫序）

1. [美]傑克·凱魯亞克著、王永年譯：《在路上》，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
2. [英]艾倫·狄波頓著，南治國、彭俊豪、何世源譯：《旅行的藝術》，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
3. 也斯：《香港文化十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
4. 王恩涌等編著：《人文地理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5. 世界文學編輯委員會編：《旅行文學》，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6.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7. 李歐梵：《都市漫遊者》，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
8. 李歐梵：《尋回香港文化（合訂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
9. 李歐梵：《尋回香港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
10. 胡錦媛：《臺灣當代旅行文選（增訂版）》，台北：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年。
11.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12. 陳室如：《相遇與對話：台灣現代旅行文學》，台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年。
13. 陳智德：《根著我城：戰後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學》，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14. 陳智德：《這時代的文學》，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
15. 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增訂三版）》，臺北：大安出版社印行，1988年。

三、文集論文（姓氏筆畫序）

1. 也斯：〈旅程與文學〉，載也斯：《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香港：青文書屋，1996

年，頁 125-129。

2. 羅貴祥：〈本土與他性的再想像〉，載梁秉鈞、陳智德、鄭政恆編：《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1 年。
3. 潘國靈：〈「本土」的十年變化〉，載朱耀偉主編：《香港研究作為方法》（香港：中華書局，2016 年），頁 252-261。

四、期刊論文（姓氏筆畫序）

1. 王家琪：〈從八十年代初香港作家的中國遊記論本土的身份認同——以《素葉文學》為例〉，《臺大中文學報》第 50 期（2015 年 10 月），頁 77-116。
2. 王展煒：〈解構潘國靈小說：作者與文本的互涉關係〉，《百家文學雜誌》第 20 期（2012 年 6 月），頁 20-25。
3. 凌逾：〈創世紀的寫托邦與消失美學——論潘國靈首部長篇《寫托邦與消失咒》〉，《文學評論》第 46 期（2016 年 10 月 15 日），頁 39-48。
4. 凌逾：〈開關新時代符號創意：潘國靈小說論〉，《香港作家》2015 年 7 月號（2015 年 7 月），頁 14-17。
5. 凌逾：〈與潘國靈對談錄（下）——關於跨界、消失與詩性（訪談）〉，《城市文藝》總第八十八期（2017 年 4 月 20 日），頁 66-70。
6. 區仲桃：〈也斯旅遊文學的多元角度〉，《中外文學》第 46 卷第 1 期（2017 年），頁 45-75。
7. 張清秀：〈那些年、那些事——潘國靈筆下的都市記憶〉，《文學評論》第十九期（2012 年 4 月 15 日），頁 117-118。
8. 曹金羽：《漫遊者與自我的起源》，《社會理論學報》第十九卷第二期（2016 年），頁 483-601。
9. 陳建忠：〈在浪遊中回歸：論也斯環台遊記《新果自然來》與一九七〇年代台灣文藝思潮的對話〉，《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 11 卷第 1 期（2013 年 6 月），頁 118-137。
10. 黃怡、羅樂敏訪問，羅樂敏整理：〈在焚燬中的城市談創傷和堅持——韓麗珠、潘國靈的對談〉，《字花》第 92 期（2021 年 8/9 月號），頁 10-18。
11. 樊善標：〈也斯中國風景之發現——以《昆明的紅嘴鷗》遊記為中心的分析〉，《中國文學學報》2018 年第 9 期，頁 273-296。
12. 鍾怡雯：〈旅行中的書寫：一個次文類的成立〉，《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4 期（2008 年 3 月），頁 35-52。

五、網絡資料（姓氏筆畫序）

1. 楊喜盈：〈潘國靈：總有些時光在路上，旅行見證下的生命軌迹〉，《明報·星期日文學》（2022 年 3 月 6 日），<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20306/1646504061937>（2023 年 3 月 25 日瀏覽）
2. 潘國靈：〈閒置空間再利用概論（之一）〉，《頭條日報·靈感國度》，（2012 年 6

- 月 25 日)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columns/28/20120625/195229/> (2023 年 3 月 28 日瀏覽)
3. 潘國靈：〈閒置空間再利用概論（之二）〉，《頭條日報·靈感國度》（2012 年 7 月 9 日）<https://hd.stheadline.com/news/columns/28/20120709/196950/>（2023 年 3 月 28 日瀏覽）
 4. 潘國靈：〈閒置空間再利用概論〉，《頭條日報·靈感國度》，（2012 年 7 月 16 日）<https://hd.stheadline.com/news/columns/28/20120716/197898/>（2023 年 3 月 28 日瀏覽）
 5. 潘國靈：〈廣州紅專廠遊記〉，《頭條日報·靈感國度》（2012 年 9 月 17 日）。<https://hd.stheadline.com/news/columns/28/20120917/205831/>（2023 年 3 月 28 日瀏覽）
 6. 鄭思珩：〈旅行作為生命隱喻·潘國靈首部遊記【新書推介】〉，《文化者 The Culturist》（2022 年 4 月 4 日），<https://theculturist.hk/2022/04/文化/閱讀/旅行作為生命隱喻-潘國靈首部遊記>《總有些時光在/》（2023 年 3 月 25 日瀏覽）

附錄一：《總有些時光在路上》各篇寫作日期

章節	目次	篇名	寫作日期
一、游離省思：旅行的意義	1	〈旅行的意義〉	2009年7月3日
	2	〈流浪的意義，及其不可能〉	2011年10月
	3	〈重遊，或「重讀」一座城市〉	2011年12月7日
	4	〈機場故事雜憶〉	2013年8月15日
	5	〈的士司機雜談〉	2011年10月20日
	6	〈圖書館旅人〉	2011年11月
	7	〈酒店可以是這樣的〉	2020年1月15日
	8	〈旅遊文化中的城市主客〉	2013年2月21日
	9	〈景點之作用〉	2015年10月21日
	10	〈我思游離——作為生存態度、現代情狀與價值轉向〉	2020年12月23日完成
二、澳門雜憶	1	〈澳門作為香港的「對照記」〉	2006年6月
	2	〈從大三巴看廢墟的意義〉	2006年3月
	3	〈杜琪峯的澳門情意結〉	2006年10月
	4	〈《激戰》及香港電影中的澳門〉	2013年8月29日
	5	〈澳門雜憶，從此到彼〉	2020年11月8日
	6	〈玫瑰堂裏的禱語〉	2020年1月
三、盛夏巴黎	1	〈巴黎日記〉	2003年7、8月
	2	〈巴黎影像私語〉	2004年2月
	3	〈那年那天，在蒙帕那斯墓園〉	2009年10月
四、愛荷華記	1	〈愛荷華的夢〉	2007年11月
	2	〈愛荷華相遇〉	2008年7月至8月
	3	〈文學之城〉	2013年1月16日
	4	〈十年，時間將東西變成隱喻〉	2017年9月30日
五、再會紐約	1	〈第三個紐約〉	沒有寫作日期
	2	〈獨立電影院〉	2010年3月4日
	3	〈洛克斐勒中心〉	2010年4月29日
	4	〈Elliot Tiber——「石牆事件」見證者〉	2010年4月1日
	5	〈表象就是真相之安迪·華荷〉	2010年7月20日
	6	〈屬於紐約和歐洲的蘇珊·桑塔格〉	2010年7月27日
	7	〈從卜·戴倫，看一個「小波希米亞」〉	2010年8月19日
	8	〈一則「反塗鴉運動」的故事〉	2011年5月5日

	9	〈從遺忘鐵道到空中花園〉	2011年12月1日
	10	〈紐約地鐵博物館遊記〉	2011年11月17日
	11	〈歸零地〉	2007年9月10日 (重寫於2021年11月4日)
	12	〈反省缺失〉	2011年11月24日
六、印象杭州	1	〈城市名目〉	2011年6月
	2	〈舊都與新城〉	2011年7月
	3	〈印象西湖〉	2011年8月1日
	4	〈女性化城市〉	2011年8月
	5	〈杭州詩詞之旅〉	2011年8月17日
	6	〈雷峰塔石〉	2011年9月
	7	〈紹興：歷史主題化〉	2011年7月
	8	〈虛實交集的「魯迅故里」〉	2012年1月5日
七、寫在北京	1	〈城市看表演〉	2011年10月
	2	〈時尚香港在三里屯〉	2011年10月
	3	〈在北京遇見香港〉	2011年10月
	4	〈北京咖啡館遊記〉	2011年10月
	5	〈看北京四合院〉	2011年10月
	6	〈水立方與鳥巢遊記〉	2011年11月
	7	〈皇家糧倉《牡丹亭》觀後記〉	2011年11月
八、文創園區	1	〈閒置空間再利用概論〉	2012年7月12日
	2	〈工業時代的舊建築重建〉	2012年8月
	3	〈華山文創園區〉	2012年6月
	4	〈松山文創園區〉	2012年7月
	5	〈一座人文茶館〉	2012年7月5日
	6	〈廣州紅專廠遊記〉	2012年9月
	7	〈文化創意園區的經營模式〉	2012年9月
九、渡劫之行	1	〈伴離之旅〉	2020年7月29日完成
	2	〈河內之行〉	2020年9月20日
	3	〈西貢之約〉	2021年9月20日完成

附錄二：潘國靈著作與《總有些時光在路上》各篇創作時間對照（部分著作曾再版，下表之記錄初版之出版時間）

	小說	詩	散文	學術論著	《總有些時光在路上》
1998	《傷城記》（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				
2001	《病忘書》（香港：指南針集團有限公司，2001年）				
2003			《你看我看你》（香港：文藝復興工作室2003年）		〈巴黎日記〉
2004					〈巴黎影像私語〉
2005	《失落園》（香港：Kubrick，2005年）			《城市學：香港文化筆記》（香港：Tomart Limited，2005年）	
2006					〈澳門作為香港的「對照記」〉、〈從大三巴看廢墟的意義〉、〈杜琪峯的澳門情意結〉
2007			《愛琉璃》（香港：Kubrick，2007年）	《城市學2：香港文化研究》（香港：Kubrick，2007年）	〈愛荷華的夢〉、〈歸零地〉（2021重寫）
2008					〈愛荷華相遇〉
2009				《第三個紐約》（香港：天窗出版社，2009年）	〈旅行的意義〉、〈那年那天，在蒙帕那斯墓園〉

2010	《親密距離》（香港：Kubrick，2010年）		《靈魂獨舞》（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		〈獨立電影院〉〈洛克斐勒中心〉、〈Elliot Tiber——「石牆事件」見證者〉、〈表象就是真相之安迪·華荷〉、〈屬於紐約和歐洲的蘇珊·桑塔格〉、〈從卜·戴倫，看一個「小波希米亞」〉
2011					〈流浪的意義，及其不可能〉、〈重遊，或「重讀」一座城市〉、〈的士司機雜談〉、〈圖書館旅人〉、〈一則「反塗鴉運動」的故事〉、〈從遺忘鐵道到空中花園〉、〈紐約地鐵博物館遊記〉、〈反省缺失〉、第六章「印象杭州」7篇（除〈虛實交集的「魯迅故里」〉外，其他全部寫於2011年）、第七章「寫在北京」全7篇
2012					〈虛實交集的「魯迅故里」〉、第八章「文創園區」全8篇
2013	《靜人活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無有紀年：遊忽詩集》（香港：			〈機場故事雜憶〉、〈旅遊文化中的城市主客〉、〈《激戰》及香港電影中的澳門〉、〈文學之城〉

		Kubrick , 2010 年)			
2015	《存在之難》（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年）		《七個封印：潘國靈的藝術筆記》（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5年）		〈景點之作用〉
2016	《寫托邦與消失咒》（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2017			《消失物誌》（《消失物誌》，香港：中華書局，2017年）		〈十年，時間將東西變成隱喻〉
2020					〈酒店可以是這樣的〉、〈我思游離——作為生存態度、現代情狀與價值轉向〉、〈澳門雜憶，從此到彼〉、〈玫瑰堂裏的禱語〉、〈伴離之旅〉、〈河內之行〉
2021	《離》（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回頭我就變了一根浮木》（鄭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事到如今—		〈旅人·不止一個〉、〈西貢之約〉

			—從千禧年到反送中》（香港：Kubrick，2021年）		
2022			《總有些時光在路上》（香港：明窗出版社，2022年）		